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①]

王永强　袁晓　阮秋荣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9）01—0133—06
DOI：10.16363/j.cnki.xyyj.2019.01.011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新疆伊犁尼勒克县科蒙乡恰勒格尔村东，地处喀什河中游沟口处，北邻依连哈比尔尕山，南与阿吾拉勒山隔喀什河相望，海拔约1200米。遗址由居址区和高台遗存两部分组成（见彩版五，图1）。该遗址在2015年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中被发现，[②] 并于当年和2016年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新疆伊犁河谷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遗迹为主体的聚落遗址，对于研究新疆史前时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社会状况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对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一、居址区

居址区位于喀什河北岸一处三级台地上，台地北高南低，南北宽约200米，东西长约400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见彩版五，图2）。台地上有厚5～10米的次生黄土堆积层，其下为卵石河床。根据古地质调查，该区域为喀什河古河道，距今一万年左右河道下切后形成台地。台地上草场丰茂，宜于放牧。三次考古工作累计发掘4500余平方米，共清理房址37座，窑址、灶（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等300余座，采集遗物标本1千余件。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燃煤遗存，出土大量煤块、煤灰、煤渣及未燃尽煤块等。

1. 房址　房址多数集中分布在台地东部的背风稍低处，中、西部零星分布。房址按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种。房址内基本都包含居住面、灼烧面、灶（火塘）、卵石坑、灰坑等，灶（火塘）一般位于房址中部。大型房址面积约100～400平方米，共计6座。最大一座F6位于台地西部，相对独立，功能和性质应比较特殊（见彩版五，图3）。这些房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属于半地穴木梁架式结构，营建方式为依山体坡度掏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四壁垒石。其后在石

---

①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18ZDA172）阶段性成果。

② 王永强，阮秋荣：《2015年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考古工作的新收获》，《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2～134页。

墙边栽立长条石，内竖木柱构成墙体，并在房址中央围绕灶址栽立两排木柱以支撑屋顶。个别房址墙外有一圈回廊式石砌护墙。石砌门道位于房址南侧，长方形石砌火塘位于房址中部，二者连线大致构成房址中轴线，布局严谨对称（见彩版五，图 4）。以 F25 为例（见彩版五，图 5），该房址位于台地东部，西南被 F24、F31 叠压打破，东南被 F28 叠压打破。房址依台地坡度掏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整体呈东南—西北向。平面大致呈长方形，面积约 204 平方米。房址内堆积厚约 2 米，可分为 10 层，内部迹象丰富，有柱洞、灰坑、煤堆（见彩版五，图 6）、烧坑、窖穴、基槽和烧土等 90 余处。石砌门道位于房址南侧，长方形石砌火塘位于房址中部（见彩版六，图 1），二者连线大致构成房址中轴线。F25 内出土了大量兽骨和陶、石器。

小型房址面积约 20 ~ 60 平方米，共 31 座。在台地中部零星分布，大部分集中于台地东部，且多依山梁地形呈阶梯状错落分布。房址平面形状分为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建筑形制则有半地穴和地面砌建两种。居址中部一般都有一个圆形石灶。门道方向不一致。以 F23 为例，位于台地东南角，西低东高，半地穴式，西南—东北向，平面大致呈横长方形，南北宽约 7 米，东西进深约 6 米。房址有 5 个使用期，发现有较多的柱洞、灰坑、烧土、石堆和煤堆等迹象，发现了大量煤块、煤渣和煤灰，出土了陶范、石范、炼渣、铜矿石等。

2. 窑址　共计 6 座，其中编号 Y4（见彩版六，图 2）和 Y5 的 2 座勺形窑规模较大，由窑室和火道两部分组成，南北向，窑室相对而建，相距约 2 米，火道一朝北、一朝南。火道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斜坡状。窑室近圆形，Y4 口大底小，Y5 口小底大。窑室内部堆积分层明显，有大量木炭，其中 Y4 内木炭层堆积厚 40 余厘米。木炭多用细枝或草本植物烧成。根据窑址形制及遗物，初步推测其为烧制或储存木炭的窑。除木炭外，仅在 Y5 内发现 1 块陶口沿片，夹砂灰陶，敛口，方唇，器表饰凹弦纹。

3. 墓葬　共发现墓葬 80 座，其中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有 9 座，分布零散，规模较小。形制有半地面石棺墓与竖穴土坑（石棺）墓两种，均侧身屈肢，随葬少量素面平底陶罐、带柄铜镜、铜耳环等。余均为早期铁器时代、秦汉时期等晚期墓葬。

4. 出土遗物　遗物主要出土在房址地面和上部堆积中，共约 1 千余件（套）。以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少量铜器、骨器和铁器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牛、羊、马等家畜的骨骼。陶器均手制，可辨的器形有筒形罐、鼓腹罐、折肩罐、高领罐和小陶杯等，多为平底器，少量小平底器、圈足或圜底器（见彩版六，图 3）。石器有磨盘、饼形石器、石球、石锄、石杵和石研磨器等，部分石器上残留有红色颜料。铜器有刀、锥、针、耳环等，以及较多与冶铸铜器相关的陶、石范（见彩版六，图 4）。另外，还集中发现 2000 多粒炭化黍的遗存（见彩版六，图 5）。

二、高台遗存

高台遗存北距居址区约 1 千米，地处喀什河沟口要冲，位置险要。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约 140 米。中部较高，边缘略矮，最高处约 7 米。因修建水渠、房屋、道路等，破坏严重。

2018 年我们分别在高台遗存东北角和北、南、西侧边缘布设探沟，主要是想探明其确切范围和堆积情况。试掘发现，高台本体 120 米见方，外周有约 10 米的坍塌堆积。高台本体外周采用石块砌筑，石块朝外一面及接缝处均经过细致打磨，构筑的墙体齐直规整，间隙紧凑致密（见彩版六，图 6）。高台内部见石构墙体和灰层，灰层内夹杂煤块。因解剖面积有限，尚不清楚高台内部具体结构。遗存出土陶、石器和兽骨等。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有少量的夹砂灰陶，均为罐类器物，平底或圈足。石器有饼形石器、石杵等。从出土的遗物及测年数据看，与居址区应

属互有关联的同时期遗存。

三、初步认识

1. 吉仁台沟口遗址是以青铜时代为主体兼有铜石并用时代遗存的聚落遗址。铜石并用时代遗存分布在居址区东南缘，主要是2018年发掘的两座勺形窑，即Y4和Y5。窑址内采集木炭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在公元前2600～前2400年。虽因两座窑址仅出土1片陶片，也无与之对应的参考材料，很难确定其文化属性和功用，但就其本身的发现来看仍很具价值，一是发现了新疆第一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且是具有一定功能用途的窑址；二是在年代上承接墩那高速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①] 填补了发现上的缺环；三是对于梳理伊犁早期文明的源头、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都具有很高价值，“将彻底扭转以往学术界在探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时遇到的窘困局面”[②]。

2. 居址区房址与喀拉苏遗址[③]和恰勒格尔遗址[④]等发掘的房址在建筑方式、平面形制、出土遗物等方面较为一致，大型房址也与乌吐兰墓地[⑤]、阔克苏西2号墓群[⑥]的带斜坡墓道墓在形制结构上相仿、出土器物接近，存在着强烈的对应关系。这批遗存的年代集中在青铜时代晚期，约为距今3600～3000年（见表一）。

表一　吉仁台沟口遗址与相关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

实验室编号	遗迹单位	碳十四(BP)	校正年代（BC）2σ	标本物质	遗址	地区
USA－496699	2018NJY4③	4040±30	2631～2474（93．4%）	木炭（灌木）	吉仁台沟口遗址	喀什河流域
USA－514311	2018NJY4	3960±30	2504～2399（54．5%）	木炭（灌木）	吉仁台沟口遗址	
USA－514312	2018NJY5	3990±30	2575～2466（95．4%）	木炭（灌木）	吉仁台沟口遗址	
USA－496701	2018NJH15	2920±30	1211～1020（95．4%）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USA－450555	2016NJF2	3300±30	1640～1505（95．4%）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60867	2015NJF3③	3275±30	1626～1497（93．8%）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60863	2015NJF5③	3185±30	1508～1411（95．4%）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60871	2015NJF6③	3250±30	1613～1491（80．5%）	羊距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60864	2015NJH26	3285±30	1629～1500（95．4%）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USA－513858	2018NJF25⑩	3260±30	1616～1493（87．8%）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USA－513859	2018NJF27	3120±30	1451～1291（95．4%）	炭化黍种子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60883	2015NJM49	2935±20	1211～1056（95．4%）	左踝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60892	2015NJM75	2950±25	1231～1055（95．4%）	踝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① 刘汉兴，特尔巴依尔等：《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尼勒克段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7～139页。

② 李水城：《从新疆阿依托汗一号墓地的发现谈阿凡纳谢沃文化》，《新疆文物》2017年第2期，第105～121页。

③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犁州文物局，尼勒克县文物管理所：《尼勒克县喀拉苏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8年第3～4期，第33～43页。

④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恰勒格尔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4年第1期，第32～35页。

⑤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尼勒克乌吐兰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2期，第50～63页。

⑥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特克斯县阔克苏西2号墓群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9期，第3～16页。

续表一

实验室编号	遗迹单位	碳十四(BP)	校正年代（BC）2σ	标本物质	遗址	地区
USA－513857	高台遗存东墙②	3270 ± 30	1623 ~ 1496（92．7%）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喀什河流域
BA172062	2016NKF2③	2920 ± 25	1210 ~ 1028（95．4%）	兽骨	喀拉苏遗址	
BA172063	2016NKH8	1845 ± 25	120 ~ 238AD（89．8%）	兽骨	喀拉苏遗址	
BA172064	2016NKF3H13	2895 ± 35	1209 ~ 979（95．4%）	兽骨	喀拉苏遗址	
USA－450557	2016NKH7	2970 ± 30	1265 ~ 1110（95．4%）	兽骨	喀拉苏遗址	
USA－450558	2016NTM3	3270 ± 30	1620 ~ 1495（95．4%）	马肋骨	汤巴勒萨伊墓地	
USA－450559	2016NTM3	3230 ± 30	1605 ~ 1585（95．4%）	人骨左脚	汤巴勒萨伊墓地	
BA131544	2013YNWM16	3255 ± 25	1610 ~ 1450（95．4%）	骨	乌吐兰墓地	
BA131547	2013YNWJ2	3400 ± 50	1830 ~ 1600（83．9%）	木头	乌吐兰墓地	
BA131478	2013NQF1	3290 ± 20	1620 ~ 1500（95．4%）	兽骨	恰勒格尔遗址	
BA131479	2013NQF2	3285 ± 20	1620 ~ 1500（95．4%）	兽骨	恰勒格尔遗址	
BA110434	2015YTKM24	3355 ± 35	1740 ~ 1530（95．4%）	木头	阔克苏西 2 号墓地	特克斯河流域
BA110436	2015YTKM24	3355 ± 35	1740 ~ 1530（95．4%）	木头	阔克苏西 2 号墓地	
BA110439	2015YTKM53	3295 ± 35	1680 ~ 1490（95．4%）	木头	阔克苏西 2 号墓地	
BA172042	2015YTKM53	3150 ± 25	1496 ~ 1390（91．7%）	人尾椎骨	阔克苏西 2 号墓地	
BA110444	2015YTKM82	3400 ± 30	1770 ~ 1610（91．7%）	木头	阔克苏西 2 号墓地	
BA121972	2012YXAF1 上层	3070 ± 25	1410 ~ 1260（95．4%）	兽骨	阿尤赛沟口遗址	巩乃斯河流域
BA121973	2012YXAF1 内	3070 ± 25	1410 ~ 1260（95．4%）	兽骨	阿尤赛沟口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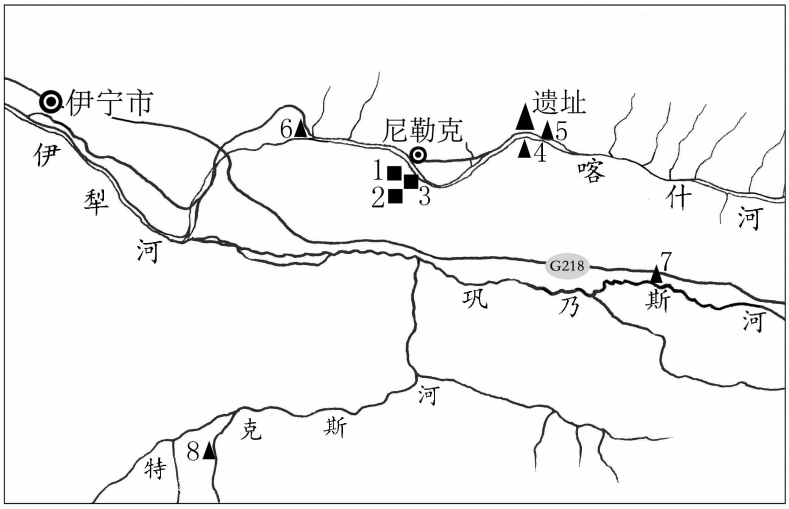
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房屋形态和陶器特征，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吉仁台沟口遗址青铜时代晚期遗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年代在公元前 1600 ~ 前 1400 年，流行居中有长方形火塘的大型半地穴式木结构房屋，兼有小型房址。大型房址结构统一，建筑复杂，讲究对称，内部遗迹丰富。陶器以平底器为主，少量圈足器，流行侈口折肩的平底缸形器和器壁较厚的长颈折肩罐。纹饰多素面，有少量刻划纹。第二期在公元前 1400 ~ 前 1200 年，房址规模有所缩小，形制趋于简陋，灶（火塘）平面形状多为圆形或多边形。出土的陶器除延续第一期侈口折肩的平底缸形器外，出现长颈鼓腹罐、长颈球腹罐、敛口或直口的鼓腹平底罐等，还有少量的圜底器，流行自内向外戳印形成的珍珠纹、附加堆纹、指甲纹等。第三期年代约公元前 1200 ~ 前 1000 年，这一时期已无典型的房址，但发现了少量墓葬，也分布在遗址区，有半地面石棺墓、竖穴土坑墓等，随葬陶、铜器。平底陶器仍占主流，戳印纹继续流行，出现了自外向内戳印的圆圈纹。新见侈口鼓腹平底罐、敛口小陶罐等。其中装饰弦纹和三角刻划纹等特征的侈口鼓腹平底罐应当受到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

3. 高台遗存与房址区相距仅 1 千米，出土遗物一致，结合碳十四数据，其年代与吉仁台沟口遗址青铜时代晚期遗存第一期相当。高台遗存的发现和发掘进一步明确了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功能分区。另外，高台遗存地处沟口要冲，沟通东西，向沟外可连接乌吐兰墓地、喀拉

苏遗址，向内可连接吉仁台沟口遗址居址区、穷科克遗址①及汤巴勒萨伊墓地②，是将喀什河流域青铜时代遗存串联起来的关键点。高台遗存相较于周边同时期遗存，建筑更为复杂，规模更为壮观，其四周围砌规整石墙以及近一万五千平方米的面积显示了其特殊地位，是新疆史前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规格最高的石构建筑遗存。结合居址区大范围的遗址堆积、大型的单体房址、贯穿遗址始终的燃煤遗存、丰富的出土遗物，推测吉仁台沟口遗址是伊犁河上游的中心聚落之一。

4. 遗址内动物骨骼数量极多，鉴定分析表明以家养的羊、牛、马为主。稳定同位素食谱研究显示，羊、牛采取放养与饲喂相结合的方式，马主要是以放养的形式进行管理。残留物检测分析表明陶器内部有奶和脂肪的残留。固定的房屋居所，选择在冬季仍然可以获取草料的牛、羊、马三类动物蓄养，使用次生产品等，这些迹象表明遗址的先民们已进入成熟的畜牧阶段。青铜时代晚期从第一期到第三期由规模宏大、形制统一的大型房址到形制多样的小型房址再到只有灶址的居址变化，不仅显示了从固定居址到可拆卸居址（可能是帐篷）的转变，也显示了人们流动性的增强。结合近年来在西天山地区博尔塔拉河流域发现的阿敦乔鲁和呼斯塔遗址及其相关研究，③ 体现出青铜时代晚期西天山地区畜牧向游牧的转变过程。

5. 遗址中与冶铸活动相关的遗迹、遗物极为丰富，有炼炉、铜矿石、铜锭、风管、坩埚、陶范和炼渣等（见彩版六，图7），是新疆史前完整冶金证据链的首次发现。调查显示，遗址附近分布有奴拉赛、圆头山和克孜勒客藏北三座古铜矿遗址，其内均发现有古矿坑和炼渣（图一）。吉仁台沟口遗址中虽出土有铜矿石和炼渣，但是数量极少，结合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晚期的冶炼流程，应是在矿料产地将铜矿石加工成铜锭再运至居址区，其后加工制作铜器，亦即当地古代居民主要承担铸造这一过程，冶炼活动则进行较少。遗址



图一　吉仁台沟口遗址及附近铜矿点分布示意图

1. 奴拉赛古铜矿遗址；2. 圆头山古铜矿遗址；3. 克孜勒客藏北古铜矿遗址；4. 乌吐兰墓地；5. 穷科克墓地；6. 喀拉苏遗址；7. 阿尤赛沟口遗址；8. 阔克苏西2号墓群

① 刘学堂，关巴：《新疆伊犁河谷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第106～108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合刊，第13～53页。

②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汤巴勒萨伊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2年第2期，第4～20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汤巴勒萨伊墓地（2016年）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7年第4期，第95～102页。

③ 贾伟明：《史前游牧生业的考古学观察——新疆西天山史前聚落分析》，《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63～75页。

内出土的范以陶范为主，石范较少。陶范多为泥质褐陶，硬度较高。铸造一般使用合范技术。可制作的器物包括针、锥、泡、刀、镞、镜、啄戈、短剑等生活工具和武器。还发现有成套陶范范料、废料等。此外，遗址还出土几件铁块和较多铁炼渣。这些新发现对新疆乃至中亚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

6. 使用煤炭作为燃料这一行为贯穿了遗址始终，延续长达六百多年。在遗址地层、房址、灰坑等遗迹单元内均发现有数量极为丰富的煤类遗存，有煤的堆放点、燃尽的煤灰、未燃尽的煤块等，这些现象表明在距今约 3600 年前后，吉仁台沟口人群已充分认识煤的特性，并将其广泛应用于生活领域。尼勒克县煤炭资源丰富，遗址西及西南四公里范围内即分布有六处露天煤矿。遗址内及露天煤矿采集的煤炭样品对比分析表明，遗址中的煤源自本地。以往的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在战国晚期开始使用煤炭作为燃料，[①] 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现将人类对燃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这在人类能源利用史上无疑是里程碑式的发现，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要考古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伊犁河流域同时期的喀拉苏遗址、阿尤赛沟口遗址并无使用燃煤的迹象，博州的呼斯塔遗址、阿敦乔鲁遗址等也均未见到，或许是因吉仁台沟口遗址煤炭的获取及开采极为便利，而其他遗址则相对不便，不如木材等燃料获取便利所致。这一现象仍是后期考古发掘和调查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一点。

7. 早在距今 5000 年左右的铜石并用时代，跨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已经出现，[②] 但是直到距今 4500 ~ 3500 年，东亚起源的农作物粟黍和西亚起源的小麦和大麦才在中亚东部和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出现混合利用的迹象，[③] 然而粟黍类作物向西传播的路线并不十分清楚。吉仁台沟口遗址集中出土了两千余粒炭化黍种子，氮同位素数值分析显示当地居民是 C3 和 C4 混合饮食，粟、黍等 C4 类作物已是较为重要的食物来源。[④] 黍种子的测年为 3120 ± 30BP，校正后的年代在公元前 1451 ~ 前 1291 年，结合新疆新塔拉[⑤]、阿敦乔鲁等遗址[⑥]黍的发现，为研究黍的西传路线提供了重要线索。

（作者单位：王永强、阮秋荣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袁晓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

责任编辑：陈　霞
责任校对：李文博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神木县窟野河上游秦长城调查记》1988 年第 2 期，第 1 ~ 9 页。

② 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1 期，第 28 ~ 37 页。

③ 董广辉，杨谊时等：《农作物传播视角下的欧亚大陆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7 年第 5 期，第 530 ~ 543 页。

④ Wei Wang，Yongqiang Wang，“Human Diet and Subsistence Strategies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to Historic Times at Goukou，Xinjiang，NW China”，*The Holocene*，1，9，2017，pp. 1-11.

⑤ 赵克良，李小强等：《新疆新塔拉遗址农业活动特征及其影响的植物指标记录》，《第四纪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219 ~ 225 页。

⑥ 丛德新，贾伟明等：《阿敦乔鲁：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新类型》，《西域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15 ~ 27 页。